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文周刊·广角

2020年10月18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美编 黄文倩/校对 温瀚

A6

《夺冠》的成功对体育题材电影创作的启示

从“不可能”到“不可能！”

□祁海

以现代观念诠释女排精神

在许多人眼中,不怕流血流汗,夺冠为国争光,就是“女排精神”的全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每次夺冠,都是举国欢腾,《夺冠》上半部再现了这个燃情年代。

但《夺冠》并非简单地怀旧,该片的故事延伸到21世纪,竟出现了另一番真实景象:新一代中国女排球队疲弱涣散,在国际比赛败多胜少,即使赢球也不见全国同胞上街狂欢。女排队员的价值观念也与以往不同,主攻手竟说她打球就是为了赚钱,让乡下父母脱贫;曾为国争光的女排老将郎平,竟出国当教练,指挥外国球队打败了中国女排。

这是不是说女排精神已经过时?非也!《夺冠》要用一种新的思想观念延续女排精神,主要是通过塑造一位反传统的“另类”爱国者郎平去完成。郎平真心爱中国女排,但她清醒地看到中国女排不可能脱离已发生巨变的大环境,中国女排若要重新崛起,队伍建设模式必须求新求变,为此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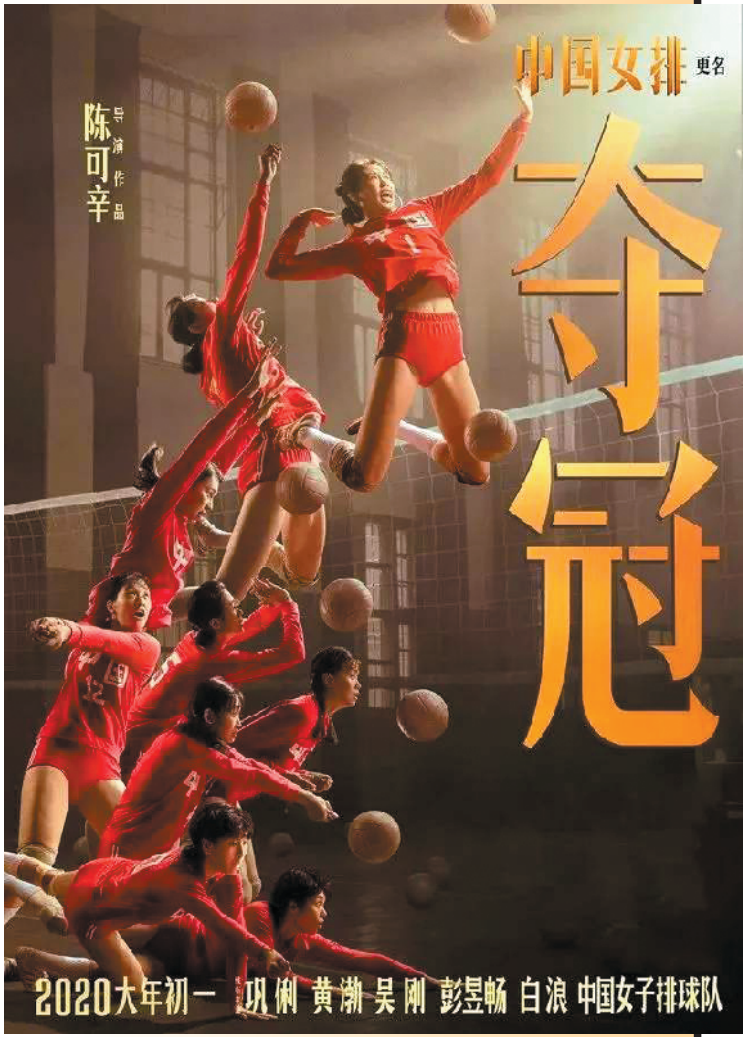
要承受比流血流汗更艰苦的巨大压力。郎平到外国球队执教,是为了拓宽国际视野,卧薪尝胆,但遭世人误解。她回国执教之后挑战旧观念旧体制,更是前路艰险,也要挨骂!忍辱负重,是一种更可贵的拼搏精神。

对于“夺冠”的含义,郎平有新的理解。一位外国记者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郎平回答:“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价值。”郎平培养的新一代球员也是强者,但“强”的第一标志已不是奖杯,而是看一个人是否有不断进取的奋斗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即使不赢球也虽败犹荣!这便将爱国热情上升为人生哲理,使女排精神的价值大拓展,冲出国界,让更多的人共享。

《夺冠》后半部的郎平,已不是只会拼体力的运动员,而是一位改革家,其胸怀境界,是以祖国产体育片里的主人公无法比拟的。

一部电影,能不能做到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都出新?很难!这两者之一能出新,已属成功之作。

但是,世界上再难闯的险关,也有勇者敢碰。取材于中国女排真实事迹的故事片《夺冠》,就做到两个观念都有新突破!这是我国体育电影在艺术上的一大突破,对今后同类题材电影的创作颇有启示。



融三大流派电影艺术于一炉

当下观众的文化素质越来越高,对艺术创新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回望新中国的体育片,不论是亮丽活泼的《女篮5号》《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还是触及运动员个人悲欢离合命运的《沙鸥》《排球之花》,都是轻量级的小巧型作品。《夺冠》完全打破以上模式,风格样式定位为厚重的史诗电影,有广阔的社会大背景,见证近四十年曲折变幻的时代风云,这样的大格局大气派,在国产体育片中当属首创!

但是,电影写真人真事的历史,容易拍成平淡单调的流水账,《夺冠》如何攻克这个难关?

电影艺术有三大流派:影戏美学的强项是故事好看和表演生动,影像美学的强项是画面造型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纪实美学的强项是生活氛围特别真实。这三大流派各有所长,又有各自的局限性。

在一部电影里,能不能同时展示这三大流派的精华,使之交融互补?许多人认为无法三全其美,但《夺冠》又将这个“不可能”变成:“不,可能!”

《夺冠》创作人员观念开放,多才多艺,善于兼容。无论纪实美学,还是影戏美学、影像美学的手法,都拿过来糅合一起,为我所用。

写真人真事的史诗电影,其

总体风格首先要体现纪实美学特征。《夺冠》表现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穿戴很土,但纯真热情。全国东西南北中的群众都围着小黑白电视机看排球赛,为女排夺冠而擎国旗举火把上街游行狂欢……经历过那个火红年代的观众,都觉得格外真实亲切。

更难得的是,《夺冠》不是只求真实。《夺冠》很有戏,但并非胡编乱造,而是善于发掘真实历史中本身就具有戏剧性的生活素材,加以提炼强化,巧妙编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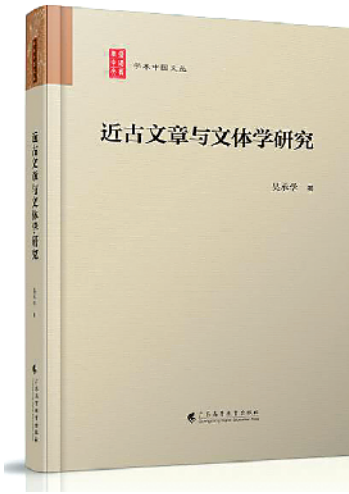
该片借鉴了戏剧化电影刻画人物性格、人物关系变化发展的手法。女主人公郎平在影片前段是勤学苦练为中国夺取五连冠的女排“铁榔头”,后来居然成为外国女排主教练,带领外国队在家门口北京打败中国女排,最后又回国当中国女排主教练,带领落后多年的弱队东山再起,打败外国强队,重登世界冠军宝座。

如此大起大落的反复变身,充满强烈的戏剧性,但确是真实郎平的经历,不违背影片的纪实风格。巩俐扮演中年郎平,十分恰当,不仅是演技娴熟,更重要的是精神世界的成熟,已到中年的巩俐阅历丰富,饱经沧桑,再不是当年《红高粱》里的小新娘,她就更容易理解郎平。剧中的郎平与陪打教练的关系也复杂多变,从亲密战友到竞争对手再到让贤互助,很有戏。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学林

□吴承学



四十载聚焦文章学与文体学

本书是我在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方面的部分成果。所谓“近古”,或称“近世”,指宋代以降至现代之前。学术界对于中国“近世”的政治、文化的特点,多有论述。本书比较集中地讨论近古的文章学与文体学。

中国文学学盛于南朝,近古又是一次极盛的时期,其研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远迈近代。“辨体”之风,自宋代而来,至明清而集其大成。对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是近古文学批评的核心议题之一。宋代以后,古文取代了骈文的统治地位,文章学也随之发生重要转向:从魏晋南北朝的骈文文章学转而形成古文文章学。从骈文中心时代到古文中心时代,文章学的评价标准

发生明显的变化。近古以来的中国文学学、文章学对于现代中国人的影响更大,更为直接。本书从一些比较特殊、少人注意的理论形态切入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学与文章学。比如,近古以来的文章总集与文章学、文体学的新形态,评点之学的渊源流变,目录学与文学批评,类书与文学批评,近古以来文章学与文体学新形态,以及相关的经典文学作品。

书中所收的论文,最早写于1982—1984年期间,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最晚则是刊于《学术研究》2020年第六期的文章。本书写作时间的跨度差不多贯穿了我已有的学术生涯。

回首匆匆,许多经眼事物,转瞬之间,已成遥远的过去。

从蹒跚学步到独立放飞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出生于潮州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祖父长期在海外当私塾先生,“文革”中回国。父亲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考古、电影等文化工作,解放后回到潮州任中学语文教师。从小学开始,我就遇到“文革”,一夜之间变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幸好,温馨的家庭、丰富的藏书给我以最大的慰藉与鼓励,善良而有主见的母亲总是鼓励和支持孩子们读书向上的。对我来说,这种印象是刻骨铭心的。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所谓的学习,完全是出于纯粹的兴趣,没

有任何功利目的,当然也相当粗浅和零碎。但这些无心插柳之举,居然为后来的专业研究打下某些终生难忘的“童子功”。更重要的是,我从小就明白自己的喜爱与特长,多年以后,以研究中国文化为志业便自然而然成了我的不二选择。

“文革”结束,我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大学生,后来又继续攻读硕士、博士,圆了少年时代做读书人的梦想。改革开放的时代,进入学术领域。那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年代,在前辈学者的引领下,我们很快便完成了从蹒跚学步到独立放飞的过程。

站在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任何一代学者,都是承前启后的。承前,决定了一代学者的素质与水平;启后,标志着一代学者的地位与影响。如何评价我们这一代学者,这有待来哲。

固执传统“发现”历史

一代学者所处的大环境相似,所以有一定共通之处;一代学者的个性与兴趣不同,所以又各有差异。在这一代人中,我就是一名教师和学者而已。曾有学生问我,在八九十年代的学者中,我个人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答曰:固执传统。“固执”是研究态度,“传统”是研究领域。

我的主要工作,是赓续和阐释近代以来受外来学术影响而中断的传统学术,一直集中在传统

领域里的传统话题:中国诗文批评、文章学与文体学等,意在立足本土文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到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学文本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重现中国本土文学与理论的特殊光辉。传统的入文学,主要是学术的积累与阐释,有些研究对象是亘古话题,并非无中生有的“创新”。要“开拓学术之区宇”,必先“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不同时代的接受者由于视野不同,对传统话题有新的理解与阐释,用自己的思想与情怀和古人对话,从而获得渐次的推进。我总认为,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提出有学术史意义的问题并期待解决,而不是为了填补空白。填补空白并不一定有意义,并非所有空白都需要学者去填补。文化创新的同时,需要文化保护。某些传统是需要有人保守,有人呵护的,就像茫茫大漠中的敦煌石窟需要一代代的守护者。

古人说,勤能补拙,其实,恒亦补拙。我别无所长,若有的话,便是固执。四十年来,固执于传统领域的研究。日于是,继之以夜;月于是,继之以年。坚守寂寞,远离喧嚣,以冀盈科而进,聚沙而成塔。

从事教职出于快乐选择

世上有许多伟大、荣耀的工作,我对之虽然佩服,但不羡慕。正如古人所说的,“我与我周旋

久,宁作我!”我深爱自己的工作 and 职业。我并不认为它比其他职业更为神圣、崇高,只是最适合我罢了。

小时曾读柳宗元《捕蛇者说》,印象极为深刻。永州有三代从事捕蛇者,虽然“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在赋税制度下,捕蛇这种貌似最危险的职业,却能得到相对的安全与自由。不知为什么,我读这篇文章,常常会产生一种完全相反的怪诞联想。我们家世代以教师为业,我的爷爷是教师,我的父亲是教师,我十多岁就开始当教师,教过小学、中学、大学,至今已四十多年。捕蛇者世代从事此业,是由于一种无奈的消极选择,而我则是出于积极的快乐选择。

虽然,教师的政治与经济地位曾非常低下,现在当然不同了,但毕竟不是有权势或可发财的职业。不过,我真喜欢教师与学者这个宁静而干净的职业,这纯粹是一种个人的爱好。说得俗一点,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说得雅一点,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陶渊明《杂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长者之言,往往老生常谈,宜为年轻人所不喜;而一旦亲涉此境,帐触遂多。我以前读此诗,领略尚浅,如今已成“长者”,读之则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矣。

以上詹詹之语,乃一时之感触耳,不知后生闻之掩耳不喜否?

显微

□刘振周

生态诗写作的可持续性



华海的生态笔记集《一声鸟鸣》分为四辑:“与鸟对话”“另一种尺度”“回到季节循环”“从笔架山到静福山”。这贯穿了“时代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现代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诗歌似乎可以处理这个现代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古代有王维、陶渊明等诗人进行田园诗的创作,诗人华海则可称得上是生态诗的当代探索者。

鸟作为自然的细胞之一,在日常生活饰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多种文学体裁都有描写鸟以及作为重要的自然意象。而华海以自己的视角看待并非仅仅鸟本身,他有自己的思考,相对应的是他对自己和生态之间关系的一种拷问与质疑。他并不像一般写作

者那样毫无节制地泛滥抒情,而是理性回望——包括他的人生历程——也就是将生命与生态联系起来,更多的是生命感和哲思。

作为散记(随笔录、杂记),无非是表达个人的见解,当然存在作者的审美,让人欣喜的是华海的《一声鸟鸣》并不以一般的“古典美”作为自己的美学主见。诗人所感受的时间(时光)流逝——大地的变迁,给诗人呈现一幅幅宏大景象,以及其中的不可抗力——从春天到冬天,从小满到芒种,从朝暮之间,在一滴水珠面前沉淀,随着/柔韧的苇叶飘舞,我感到在靠近/另一种节奏,靠近万物原来的样子”(《初夏》),这就是作者所感受到的气候(时间)的力量,是一种现代性的感觉。

“如果你想作一个诗人,首先要找回自己的故乡。”(《寻找乡野》),现代人的常态却是背井离乡的迁徙,像候鸟,不断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加上现代化在短时间内带来观念上的冲击,各个阶层的人都在寻找自己的故乡,这是诗歌的方向之一。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定义“自然”?到哪里寻找故乡?怎样缓解生存的焦虑?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也是生态诗的关注主题,可以为自然写作注入文学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以及可持续性。

谈屑

□李明

茶中有真义

切中话题,言不凿空

曾园的茶文集《有茶气》副标题:“谬误与传说中的中国茶”,更明确地传达了主旨趣所在。谈茶在历史流变中往往会形成话语共存的局面,传说、谬误在所难免,还会与其他话语形成竞争态势。作者有意拨乱反正,从这个立场出发,“有茶气”至少有两层意思:其一,谈茶时要诚心正意;第二,谈茶者要有精神气质。

众所周知,茶叶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谈茶要谈出气质,不能不面对两个底线:物质方面不能有硬伤,精神方面不能自我阉割。从话题、文字到内容,《有茶气》表现出了难得的“品质感”,把这种品质感切开来,会发现不同的观察面。

切中话题,言不凿空。话题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人们对某些问题的关注。近年来,普洱茶话题热度一直不减,各种看法聚讼不已。《马云为什么去做普洱?》《方舟子谈茶,茶人应感欣慰》《都说换美元不如存茶,但存茶并不容易》等篇,都与普洱茶高度相关。其他如《喜茶疑云》等篇也紧扣当下话题。可以说其涉及的内容都是题有所出,言有所指。“在普洱茶里,人人争说‘老班章’和‘冰岛’等名山,这些名山不好买,买下来也有可能‘扑街’,因为意外太多。”意外太多,寥寥数字,便概括了这个行业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话语历史缝隙中发现“真相”

某种意义上,“意外太多”就是信任危机一直存在。于普洱茶而言,整个话语形塑的过程,似乎印证了外国学者解释中国历史时提出的“冲击—反应”观点。最初,外地人带着老茶和书籍回到原产地云南,敞开了普洱茶关闭许久的

大门,经过这二三十年的演变,普洱茶在话语上的努力,更多是在寻找一种本土自信。广袤的云南茶山因此成了最后的竞争领域。茶山保留了原始大茶树,也存在经过人工驯化的大片茶园,进入这些区域的人可以观察“现场”,并以此为凭,制造出大量的看法和说法。这同时也提醒我们,过于偏执、过于喧嚣与滥用话语几乎可以找到相同的傲慢。

善于在话语历史的缝隙中发现“真相”。关于历史,我们是去发现,还是去构建,历来争论不休,但历史存在缝隙却是不争的事实,谈茶的话语历史也不例外。作者看到了这些话语里的一个个缝隙,将其串联起来,形成某种“真相”。《唐诗中的党争与茶税》可以归入“以诗证史”的范畴。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不同学者对其理解不同,有人看重诗的背景和历史意义,有人看重诗的美学价值。以诗证史虽然是一条不错的路径,但精微的考证和对历史脉络的把握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在这里主要引用了陈寅恪的研究成果。《末茶笔记》文本来源比较广泛,有诗史文献,有名词考证,有笔记小说,这么多材料,如何从其中理出头绪,大有讲究。有遮蔽,就会有发现,有连续,就会有断裂,有建构,就会有解构;作者自由穿行于文本之间,对其进行富有价值的解读。

发现话语背后观念的演变

善于发现话语背后观念的演变。《有茶气》表现出了一种审慎功夫,表面看起来是文本细读的功夫,核心却是通过敏锐的观察,看到话语背后观念的演变。卢仝的孤狂,是技艺的衰微,还是精神的没落?宋徽宗的时间穿越术,是权力的高压效应,还是审美的变相满足?中国茶叶因何衰败?中国有没有茶道?作者也直抒己见:“我慢慢发现,中国人喝茶,能够品出其他民族觉察不了的味道,茶道之上,正是中国人的味道。”

在当今这个谈茶话语普遍撕裂的时代,谈什么往往形成表面的冲突,而搞清楚谁在谈、怎么谈、为什么谈,也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话语有时完全对立,有时又相反相成,竞争态势并不意味着你死我活,“真相”的变迁依赖于具体的词汇、句式和陈述关系,也隐藏在各式各样的解释框架中,其意义也随时间、地点、环境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